

编者按语

冒辟疆系明末清初如皋人氏，其诗文为当时文坛所推崇，亦为后代所景仰；其爱国热忱更为后世知识界所称颂。辟疆后裔冒舒谨同志曾著文《冒辟疆其人其事及其书法》，登载于香港《书谱》。现将本文删节后转载于此，以飨读者。因本刊篇幅有限，同时为了着重介绍其生平事迹，故略去书法部分，更改题目为《冒辟疆其人其事》。

冒辟疆其人其事

冒舒谨

一代风骚主坛站①

冒襄（1611——1693），字辟疆，别号巢民，江南如皋人，明末诸生，和方以智（密之）、陈贞慧（定生）、侯方域（朝宗）并称“四公子”。他们联结东林后人和复社诸子，横议朝政，品覈公卿，砥砺名节。辟疆先生少负才名，弱冠即受知于董其昌、陈继儒、范景文。崇祯间，应试金陵，屡试不售，仅以乙榜两中副车。史可法曾以人才荐举，特疏辟为监军，御史、举台也交章

推穀，皆辞谢不就。不久，朝廷以恩贡特用为司李，未赴任而申之变起，从而隐居不仕，而名声愈益彰著。入清后，康熙时屡次以山林隐逸、博学鸿词举荐，也借词拒不应召。辟疆家故有水绘园，富有花木池沼、亭馆楼阁之胜。明亡后，易园为庵，以示伤心国变。当时清流俊彦、隐逸子遗，或应邀馆舍，或慕名投止，莫不视水绘庵如复壁大隧，宾客云集，极一时盛况。辟疆生平好施，广交游天下士^②，无论识与不识，都乐与款通声气。当时有人说：“士之渡江而北，渡河而南者，无不以如皋为归。”

“及家日贫，犹不敢谢客，而身则皤然老矣。”^③辟疆晚年益以图书自娱，著述甚富，行世者，有《先世前徽录》、《樸巢诗文集》、《水绘园诗文集》、《同人集》、《影梅庵忆语》、《寒碧孤吟》等。

自愧鸛駘质，蒙推国士稀^④

疆辟幼有神童之誉，天启四年，他才十四岁，即以诗见赏于董其昌。董比冒作王勃，认为他少时的“才情笔力已是名家上乘。安知非高常侍五十为诗，韦苏州六朝吟客，千锤百炼，撚破髭髯者，习气未尽，再入词场，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耶！”这位八十高龄的“大宗伯”，对一个新进少年的雏凤清声，竟然如此推崇，可算难得的了。董冒初不相识，天启七年，辟疆去扬州，才得机会面谒这位当代的文苑巨擘。因而，董给冒的第一封信中说道：“久读瑶章，未挹玉树。邗关小憩，渥贶先施。意气之交，自此始矣。”另函又谓：“邗沟之会，得晤玉山，足快平生怀企之私，”并且推许其诗“自当与陈思王洛神赋等观”。董卒于崇祯九年，这一年的秋天，他接展辟疆的寄诗（编者注：寄诗即《柴门诗》，诗云：“柴门茅屋两边开，旧日朱门竞草莱。幸有高堂存厦屋，更余古榭映楼台。四围篱落岩松石，三径栏回

潘竹梅。天放数椽文敏笔，惟公许我滴仙才。”）后，还于病中勉力函复：“展新诗，何减与留侯洗马把臂入林；叹子安，摩诘之再世也。”⑤

辟疆诗中提到“天放数椽文敏笔”，是由于他曾经把董其昌历年给他作的序记、诗歌、题跋、手札和所临的颜、米诸家书法，一一摹勒上石，镌刊为《寒碧楼帖》。董其昌为冒家所榜书的“得全堂”三字擘窠斗书，早年制成匾额悬挂中堂。抗日战争前，我尚亲眼得见这个匾高悬于水绘园中，无奈战时已为驻在皋城的日寇掠夺东渡了。

蓬门长日掩，心迹几人知⑥

辟疆晚年穷困无以为生，惟赖卖字度日，常是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字，及晨有人持金易购而去。七十九岁时，他有《卖字五狼偶成三绝》（五狼即今南通），一倾心声：

“偶发游山兴，聊为卖字翁。寄怀付老笔，莫漫此相逢。”

“七十何所求，而况当八秩？渊明拙言辞，吾以托之笔。”

“春蚓与秋蛇，虎卧并龙跳。我愿识字人，放眼观其妙。”

康熙二十八年，辟疆自述：“献岁八十，十年来火焚刃接，惨极古今！墓田丙舍，豪家尽踞，以致四世一室，不能团聚。两子罄竭，亦不能供犬马之养，乃鬻宅移居陋巷独处，仍手不释卷，笑傲自娱。每夜灯下写蝇头数千，朝易米酒。家生十余童子，亲教歌曲成班，供剧饮，岁可得一二百金，谋食款客。今岁俭，少宴会，经年坐食，主仆俱入枯鱼之肆矣。”⑦

同年十月，老人为幼孙筹措旅中费用，不惜以八十衰龄冒风霜之苦，亲往邻邑告贷，而结果大失所望，费尽唇舌，看饱嘴脸，止得银十两。不料所访旧交邑宰边某忽然病故，亲临其丧，所耗奠仪连同旅途花销，共用去廿金，一时囊空如洗，狼狈而归。

一个风华旷代的诗人，晚景如此萧寂，也真是“志士凄凉闲里老”。这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：“老去益贫贱，门前叹客稀。一庭书寂寞，四壁多因依。”⑧

他的老友龚鼎孳（芝麓）在题水绘园诗集时，深有感慨地说“辟疆东都名士，秦川贵游，风流映座，声华被物。……而今乃纸窗雪夜，梵林清昼，独与二三高人衲子，寒吟凄咏于残香活火，疏灯薄醉之中，如理么琴，如扣哀玉，如幽兰之过雨，如秋城之送砧。盖其结习豪情，阃除净尽。”这一段文字，很足以帮助我们理解《柴门诗》的何为而作。

辟疆先生死后，经过一百年，到了道光年间，又有人重过水绘园，面对一片颓败的废墟，不禁怆然怀古：“一代风骚主坛坫，百年云物贙蒿莱；数椽茅屋留香火，无漫斜阳燕子来！”诗人遐想昔日的红楼碧榭凋零殆尽，往事如烟一无痕迹可寻了。

然而，那个封建时代，那个使无数有志于献身邦国的诗人毕生偃蹇、资志以终的旧时代毕竟一去而不复返了！

现在，如皋水绘园故址已被省和地方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并兴建了冒辟疆的纪念馆。

让那些阴郁的回忆随着流逝的时光而烟消雾散罢。

注：

①吴铤：《东皋咏石水绘庵》，见《如皋县志》。

②根据冒辟疆晚年哀集的《六十年师友诗文同人集》，续列平生相与偕和的文字之交友，先后有倪元璐、王铎、钱谦益、夏允彝、熊赐履、杨廷枢、方拱乾、吴伟业、龚鼎孳、陈名夏、宋荦、王士禄、王士禛、施闰章、魏学濂、顾果、吴应箕、李清、吴绮、孔尚任、余怀、杜浚、李雯、邵潜、杨文聪、周亮工、王时敏、萧云从、恽寿平、梁清标、米万

性、顾贞观，以及后辈陈维崧、戴本孝、方亨咸、邓汉仪等人。这些人中间，有的是名公巨卿，有的是文人学士，以后遭遇各各不同。宋实颖在为冒辟疆《八秩乞言》中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向之所谓立坛垞、刻名字者，何在也？向之衮衮诸贤，所谓敦名节、倡清议者，又何在也？或以水火，或以兵刃，大节凛凛，可无憾已。至于今岿然独存者，先生一人而已。百年是非，先生是定。两朝文献，先生是赖。谓非天之慙（Yin宁愿解）一遗老，不可得也！”然而即使如辟疆这样以敦尚名节自居的遗老，也只是国亡之后独善其身而已。两个儿子虽不出仕清朝，却去应试补博士弟子员，并啣父命赴北都立雪龚鼎孳（时已降清授礼部尚书职）门下。辟疆以八十之年尚日夕为他的幼孙的“功名”为念，并以获官“都督”为喜，这种种矛盾，正表现封建士大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。我们固不必厚非古人，其又独深责侯朝宗的降志辱身和吴梅村的草间偷活？

③刘体仁：《书水绘园二集后》

④冒襄：《大宗伯董公以宫保致政奉赠一章》。

⑤董其昌赏识辟疆，除了爱才之外，更有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。董为华亭（今江苏松江）大地主豪绅，为地方所恶。然据史书所载，他服官时能不徇情；明天启间宦官用事时，能深自引退告归，以示不与合污；其书名盛极一时，可是对阉竖请求写字时，一切谢绝。但他对东林、复社，却又不即不离，处两可之间，因而独免遭党锢之祸。辟疆是坚决反对阉党的，可能在这一点上，他对董的行径也深切景仰。

⑥叶澹生：《残腊再呈巢民先生》诗。

⑦冒襄：《附书劭公木见寿诗后》。

⑧冒襄：《和答叶澹生诗》。

冒

辟

疆

评

传

·
蔡

迪

在如皋城乡，有哪一位历史名人，最被广大群众所津津乐道、争相传颂的？看来不少人要举出冒辟疆。

冒辟疆是明末清初人，他生活的时期，距今已经三个世纪了，如皋人至今还把他的故事挂在口头上，什么缘故？

第一，基于乡土之情。如皋人之所以爱说冒辟疆，因为他是如皋本城的人。

第二，敬慕他是有名的才子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、诗人。他的声名在全国也是有影响的。如皋地方至今珍藏着他的诗文集，和书画遗墨，视为本地的珍宝。

第三，他有一位如夫人，名叫董小宛，原是南京秦淮河上的名妓，通诗文，善绘事。他们之间的相识和结合，还被人编成了故事，演成了戏曲。她不幸早死（卒时27岁）。一说她被清朝的顺治皇帝虏去，封做董妃。二说相互驳正，至今还没有打完这场官司。这就加倍渲染了冒辟疆故事的传奇色彩，增添了许多人口头传说的趣味性。

第四，在如皋县城里，至今人们还可以指点古老的门巷：冒家桥、冒家巷、冒公馆，以及曾是冒家的古老园林——水绘园。现在，水绘园的一组建筑，构成了如皋人民公园的一部分，供人游览，虽然认真考究起来，它早已不是冒辟疆那时候的那花园，那地方，那风景了。但游人并不一个个都要去做考据家，他们只知道“水绘园”是货真价实的冒家旧物，因而睹近代之景，思前代之人，不免引出一段怀古之幽情来。

冒辟疆就是这样仍然活在活人的记忆上。那么，今天，用马克

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，向如皋群众通俗地、正确地介绍冒辟疆的生平，以及他的思想、情操，使大家知道什么地方是应该向他学习的，什么地方是他的时代局限并不足取，不是非常有此必要么？

冒辟疆，名襄，号巢民，小名叫绳绳。明朝万历三十九年辛亥（1611），出生在如皋本城一个世代仕宦家庭。他的祖父叫冒梦龄，由选贡出任江西省会昌县知县，再任四川省酆都县知县，后因功升迁云南省的宁州知州。父亲冒起宗，崇祯元年戊辰（1628）进士，曾任南京吏部考功司的主事。崇祯六年，转郎中（相当于司长）。后来外放到山东衮西道、粤东高肇道等地任佥事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漕运紧急，起用为山东按察司副使，督理七省漕储道，直至明朝灭亡。冒辟疆小时候就跟随祖父在外省做官的任所，识字，读书，学习诗文，游览山川名胜，过着官宦世家公子的生活。少年时期，他是书画名家、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的及门弟子。十四岁，就刊刻诗集，由董其昌作序（香奁园偶存诗序）。董在诗序中盛赞学生的少年天才，把他比做唐朝的少年才子王勃。^①他的这种出身、环境和教育，决定了他成长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，而他的政治倾向、思想情操和文学风格，则主要由于师友的陶冶，和个人的努力。他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（1693），终年八十三岁。

纵观冒辟疆的一生，可以把他的前三十五年 and 后四十八年划分为两个时期，它的分界线则是崇祯十七年甲申，也就是清顺治元年（1644）。这一年三月，农民军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（朱由检）在煤山（现在叫景山）上吊，明亡。李自成入宫称帝，国号大顺，改元永昌。五月，李自成兵败西逃，清兵进入北京，宣布建立大清国，并即以是年为顺治元年。同月，逃到长江流域的明朝旧臣，趁清军正在巩固黄河流域的间隙，拥戴福王朱由崧为

皇帝，建号弘光。国情是如此迅速而剧烈的变化，几个月之内，真象走马灯一样，一会儿换一彪人马，一会儿打出一面旗号。这一年的下半年，在长江下游的南京、扬州、泰州、如皋，还在南明弘光的旗号之下。次年，即顺治二年乙酉（1645）的四月，清兵攻下扬州，史可法殉职。五月，清师渡江，陷镇江，由丹阳、句容进达南京。弘光首先溜之大吉。大臣马士英、阮大铖也先后逃走了。余下的一般勋臣、阁臣纷纷投降，其中包括素负盛誉的新任礼部尚书钱谦益（牧斋）。在如皋家居的冒辟疆，则携家带眷，由水路逃遁，直抵钱塘江北岸的盐官。这样，在逃亡中讨生活，将近一年的时间。形势的动荡、变化，产生了思想上的动荡、剧变。如果说，在此之前，冒辟疆还是朝气蓬勃的青年的话，那么，经过这次的改朝换代，兵荒马乱，就一下子进入老年了。下面就依照时间顺序，一一加以论述。

从明朝天启四年甲子（1624）十四岁（我们暂时把他的幼年时期不算在内），到崇祯十七年甲申（1644）三十四岁，共二十年的时间，是他求功名，慕正义，斗志昂扬的前半生。

自隋、唐以降，在以科举取仕的中国，读书人（尤其是仕宦世家的子弟），无不积极地赶考场，求功名，冒辟疆当然不能例外。他十六岁即赴郡试（上扬州去考秀才）。以后，每三年就要上南京去应一次乡试（考举人）。按那时的制度是，逢子、午、卯、酉年，就在省城会考一次，从诸多秀才中挑出若干举人来。到明年，即逢辰、戌、丑、未年，全国在首都举行一次会考，再从诸多举人中选出进士来。这两级考试，合称“两榜”。查冒辟疆天启七年丁卯，经过崇祯三年庚午，崇祯六年癸酉，崇祯九年丙子，崇祯十二年己酉，崇祯十五年壬午，共六次乡试，他是六次上南京赶考，一次不落。结果呢？举人是一次未中，只上了两次副榜，叫做副举。副举不算功名，不能参加首都的会试，不过

比完全落第要好看一点，得到一点自我安慰的虚名罢了。②“六试棘闱，两中副车”这件事，使得冒辟疆心中感到老大的憋气。他开始感到科场的不公，认为主考官员评阅文章的标准是颠倒的，错误的。他的这种感想可以从他的文友陆庆曾（文孙）的《冒辟疆文序》中透露出来。陆庆曾写道：

“科目之权在上，文章之权在下。在上者重之而适以轻，在下者轻之而适以重，其势然也。”③

他认为这种八股取仕的评判文章，与文章的实际价值正相反：当权者认为的好文章，实际上一无用处，蹙脚透顶；而当权者嫌弃不要的，却往往是锦绣文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：

“……方今以制义取士，奇敏异能之彦，辄俛首以就咕嗶，知其无益于天下国家之大务，乃上之所贵，不敢不诵习而究也。”所以“虽有《上林》《子虚》秩群之才，不获自致青云，文起八代之衰，或辱于一夫之目。”④

这种议论，确实是切中时弊的，也正是指出了冒辟疆之所以不能中举的主要原因，替冒辟疆吐出了胸中的一腔怨气。

虽然如此，在冒辟疆的内心深处，对于棘闱场屋，始终不服这口气。崇祯十年（1637）农民军张献忠部一度进兵仪征，扬州告急。史可法被委任为右金都御史、安徽巡抚。崇祯十五年壬午，他见到冒辟疆青年有为，曾有心保荐他为地方行政官员，但他一再辞谢不就。他说：“吾即中状元，必请为守令。天下之乱，必得真守令始奏治也。”⑤表明他不是嫌官小，实因他的志向是必登两榜，始入仕途。“必登两榜”，这是明朝士大夫中讲究出身的一种偏见。所以这一年壬午（1642），其实是明王朝最后一场乡试了（当然他自己没有料到），他还是去南京赶考，哪知又一次摔回来一个副举的虚衔。次年癸未（1643），冒辟疆三十三岁了，朝廷在被农民军打得焦头烂额、气急败坏之中，抢忙给

十多个中副榜的人一人一顶乌纱帽，给他的是台州司李，（台州在浙江。司李是州官下处理司法的官员。）可惜时间太晚了，他还没有到任，明朝就灭亡了。按照这条轨迹向下推论，若不是清兵南下，冒辟疆会不会还要第七次、第八次赶赴考场呢？完全可能。

在明代，终老场屋的穷秀才有的是，他的祖父冒梦龄（汝九），就是十次入考场也没有得中举人，以后靠“选贡”才做了县官的。所以“求功名”，这是青年冒辟疆的第一个指导思想。

那时扬州是我国东南的一大港埠，它距扬子江入海口不远，在南北水上动脉的大运河和长江交会的十字上，舟车繁忙，商业兴盛，烟花十里，在上海开辟为通商大埠之前，堪称我国东南第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。在行政上，那时如皋县是归扬州管辖的。读书人赴郡试，赴院试，必去扬州。从如皋向外地交通，也必然把扬州作为出发的第一大站。由于这些原因，冒辟疆十七岁上就跟扬州的青年郑元勋（超宗）相知，并结为文章意气之友。论年龄，郑元勋是冒辟疆的老大哥，天启四年甲子，他就考中了头名举人，在社会上已崭露头角了。他家里还有一座私人园林，名叫影园，花木扶疏，亭台错落，也算扬州的一处名胜。他交游广阔，上自安徽、江西，下至苏南、浙江，许多知名之士来到扬州，都到影园来聚首游憩，吟诗作赋。冒辟疆每来扬州，也在影园落脚，因此跟外地的诗文之友，广泛地结识起来，交流思想，切磋文章，使冒辟疆的眼界大开，文思猛进。崇祯九年丙子，冒辟疆二十六岁，东南各地的诸生，大会金陵，争应乡试。他与金坛的张明弼（公亮）、吕兆龙（霖生）、盐官的陈梁（则梁）、漳浦的刘履丁（渔仲）五个人，宰牲焚香，结为异姓兄弟。五个人都在这一天即席放歌，畅叙他们的情怀。其中吕霖生的《结交行·同盟眉楼即席作》可算是他们的代表作。我们不妨抄录其中

一部分，以见他们当时的思想抱负：

“……我生热血止一斗，藏之中心不在口。傍皇起舞为君父，安能倾吐向朋友。矧兹醜孽方陆梁，又值流氛犯郾襄。庙堂霄旰思颇、牧，速期殄灭毋鸱张。竖儒难办天下事，未闻风鹤神先悸。平生不以胆许人，肉食之谋何所济。我今誓与同志约，毋为身家植私党，毋趋名利媚权珰。留此一付冰铁骨，艰可扞兮阴可挫。南都相聚尽人豪，文章节义须甄陶。……倾盖遥逢订石交，共祈努力报清朝。指天画地应无愧，矢以贞心定久要。”⑥

这里的清朝，非指满清之清，而是指他们理想之中的明王朝廷。从这首述志性的长歌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共同的政治思想是：忠于明王朝；反对农民起义军；恼恨当朝文武的昏庸；反对结党营私；反对阉党；砥励名节。这些思想，并不是冒辟疆他们几个人所特有的，而是当时以江南复社为中心的、士大夫清流们基本一致的政纲。崇祯初年由太仓人张溥（天如）倡议，联合江北的匡社，松江的几社、江南的应社、浙东的超社、浙西的庄社，还有莱阳的邑社、中州的端社、黄州的质社，结成一个共同的团体，名叫复社。于崇祯五年（1632）在苏州虎邱召开成立大会，一时士子云集，来会者千余人，轰动了姑苏全城。是什么东西吸引着这么多的知识分子呢？试看张溥在复社成立时所宣布的《缘起》和入社的共同规约，就可以窥见复社的宗旨，因而也可以摸到青年冒辟疆的思想脉搏：

“自世教衰，士子不通经术，但剽耳佻目，冀倖弋获于有司。登明堂，不能致君。长郡邑，不知泽民。人才日下，吏治日偷，皆由于此。溥，不度德，不量力，期与四方多士，共兴复古学，将使异日务为有用，因名曰复社。”⑦

原来他们组织起来的最初动机，只是为了改进八股取仕的办

法，以改革学风罢了。即令如此，若是认真照这个宣言办，也不是一件小事，而是一场重大的教育革命。他们多少年的老八股，能够改得掉吗？他们怎么敢于提出这样革命的主张呢？他们也不可能产生如此激进的思想。他们只能拾起古人的思想资料，把它们理想化。他们不认为时代是前进的，而认为今不如昔。因而他们找到办法，不是革新，而是复古。复社的定名，正反映了它唯心的思想路线。然而他们打出复社的招牌，也模糊地直觉到是为了打开一条通行无阻的道路，因而它的实质还在于革新，所谓托古改制，此之谓也。

我们再看看复社内部的规约吧：

“毋从匪彝。（这头一条就够古拗的。其实‘彝’者，常也。就是规定入社盟友，必须遵循正常的大道行事，绝不能走斜门歪道。——笔者）毋读非圣书。毋违老成人。毋矜己长，毋形彼短。毋巧言乱政。毋干进辱身。嗣今以往，犯者小用谏，大则摈弗与。”⑧

整个规约尽是个人的修身格言，却看不见丝毫对组织和集体应尽的义务。这就难怪复社这个组织的自由和松散，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。根据吴应箕的《复社姓氏录》和吴铭道的《续录》，当时参加复社的同志，共达二千另二十五人，可以说集一时之盛了。但事实它是松散的，徒有虚名的。它们原来分散在各地的许许多多小诗社、小文社，仍然按原来的常规，三日一吟诗，五日一作文，各搞各的，地方主义的气味极其浓厚。加之当时交通通讯的落后，联络的困难，因此复社当时的虚名是大的，但实力却很空虚，禁不住敌人武力狠狠的一击。他们全是象冒辟疆、陈贞慧之类的文弱书生，本来就没有造反的意思。只是历史的进程，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为大规模武装斗争的时候，有些人往往身不由己，被卷进激湍的漩涡中去。复社的情况正是

如此。

崇祯以后，朱明王朝已经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了。以李自成、张献忠为首的两大股农民军，已经席卷了长江以北的中原大地，关外崛起的满州兵正兵强马壮，势欲入关。（已经试探性地进入关内，一直打到山东的济南，又退了回去。）而朝廷内部，政治腐败，军心涣散，刚刚除掉一个魏忠贤，又启用了更多的小魏忠贤，分别掌握着财政、军政、军需的实权。种种危急存亡的情景，不能不在复社的领导人物中激起反应。他们要救国。他们要改良政治。他们要拿起东林党的接力棒，抨击阉党，评论朝政。这样便发生了复社诸君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两次直接冲击。

阮大铖确实是一个坏东西。在《明史》中他同另一个坏东西马士英被合写在《奸臣传》中。《明史》称阮大铖“机敏滑贼，有才藻。”他确实有一点才藻，善于填词作曲，曾创作了好多部传奇剧，如《燕子笺》、《春灯谜》、《牟尼合》、《双金榜》等等，其中的《燕子笺》尤盛名一时。阮大铖是安徽省怀宁县人，所以在冒辟疆等人的著作中，凡提到阮大铖的地方，皆称怀宁而不名，以表示对他的痛恨和厌弃。天启时，魏忠贤专政，朝中凡是小人、无耻之徒，都跪拜在这个大太监的脚下，认魏忠贤做干爸爸、干爷爷。于是一般人叫这些不要脸的、狐假虎威的家伙是“五虎”、“十狗”、“四十孙”。阮大铖也是这班狐群狗党中的一条，害死了东林党里的许多正人君子。崇祯当国，魏忠贤完蛋（这是崇祯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好事），阉党一时失势，阮大铖被削职为民，流寓在南京。但他并不是一条死狗，而是鲁迅所痛斥的落水狗，他正潜伏着窥探形势，准备着一朝再起，冷不防给人反咬一口。据陈贞慧《防乱公揭本末》记载：《留都防乱公揭》的发起和属草，都是复社中坚、贵池的吴应箕（次尾）。⑨那是崇祯十一年戊寅（1638），他看到在南京带罪闲住的阮大铖，与南京的达官贵人

饮宴交游，车马盈门，仍然十分烜赫。家里养着一班戏子，每天歌舞昇平，哪里有一点知罪服罪的味道？一天，吴应箕把他看到的这种怪现象说给复社的密友、无锡的顾杲（子方，东林党的头脑顾宪成的孙子）听。顾杲拍案而起，大叫：拼掉我的脑袋不要，也要除掉这个大坏蛋！吴、顾二人又先后把他们的意见征得陈贞慧的同意。于是由吴应箕在灯下起草，写成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（即传单）。顾杲具名，复社的其他同志附署。可是与另一友人叫杨廷枢（维斗）联络时，杨却提出了反对的意见，认为阮大铖不过是“不燃之灰”，值不得大动干戈。于是双方反复论辩，打起了一场内部的笔墨官司，倒把《公揭》搁置了下来，迟迟未发。但是消息却慢慢透露出去了。至崇祯十二年己卯（1639），经一百四十人的共同签署（其中也有冒襄的签名），终于公开发散出去，逼得阮大铖一时象乌龟一样，把脑袋缩进壳去，不敢那么公然嚣张了。

对于这个《留都防乱会揭》，到底写些什么内容，我们现在可以简略地研究一下，因为它关系着冒辟疆的政治思想。

“为捐躯捋虎，为国投豺，留都可立清乱萌，逆珰庶不遗余孽，撞钟伐鼓，以答昇平事。”

这是《公揭》劈头的一句事由，它不点名的点名，攻击了落水狗阮大铖。削职为民的阮大铖，究竟值不值得公开揭发？铁的历史事实驳斥了杨维斗对阮大铖的错误估计，说他是什么“不燃之灰，无俟众溺”。血的教训是他不仅死灰复燃，而且燃起来就要置复社于死地，而且一把邪火，把个弘光小朝廷很快就烧成灰烬。认真说来，弘光朝与其说是被清兵扫荡掉的，不如说是被马士英、阮大铖自己搞垮掉的。去恶务尽。复社的错误不在于公开揭发阮大铖，而在于没有更狠地、更彻底地把他除掉。

就此，我们要指出复社诸君的历史局限性：他们赤诚的爱国

之心，同盲目的忠于一姓帝王的封建思想混为一体，他们人云亦云，称农民革命为“闯献作乱”；他们轻视少数民族，把清兵看得完全不在话下。他们哪里料到，不出五年，使崇祯皇帝吊死的正是闯献；取代朱明王朝的正是那北地的爱新觉罗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：那时江南的士大夫阶级，只见江浙一隅暂时的歌舞昇平，却对全国紧急危亡的形势视而不见，他们在政治上是极端近视的。

复社公揭事件发生的第三年（1642），又发生了桃叶渡骂座的事件。

南京秦淮河上的桃叶渡，因东晋文人王献之在这里作诗送他的爱妾桃叶而出名，这里一向成为骚人墨客歌舞冶游的所在。加之这一年岁属壬午，又逢莘莘子衿们赶文场比笔墨的时期，石头城内，真是士子如云，冒辟疆也是如期来京。那时他和陈贞慧、侯朝宗、方以智、顾杲、吴应箕等已结为亲密好友，往往同游秦淮。一次，他们在桃叶渡集会，并携有被阉党戕害死了的东林遗孤，共约三十人，置酒高会，招歌征舞。应邀前来的戏班子，正是阮大铖家里畜养的名伎，演的是他家主人的新作《燕子笺》。夜阑酒醉，大家精神亢奋起来，止不住使酒骂座，大叫“若瑄儿、媼子，乃欲以词家自贖乎”？！⑩（你太监、奶妈的儿子，妄想把自己打扮成戏剧家的样子，来欺骗人吗？！）他们的反阮活动，当然马上有人捡去献殷勤，惹得阮大铖把复社的人更加恨入骨髓。但当时他没有打击报复的办法，只好暂时憋在肚子里，正如鲁迅所说的落水狗那样，他在等待时机，而这个时机他果然等到了。崇祯上吊，福王朱由崧被明遗臣在南京捧上了皇帝的宝座，临时七拼八凑搭起一个小朝廷来。其实这副班子，不过是釜中的几尾游鱼而已：从甲申年五月他们袍笏登场，到乙酉年四月逃之“夭夭”连头带尾，结结巴巴算一年的寿命罢啦！然而封建

政权这个东西，（特别是断断续续，快要断气的时候）一朝被抓在象阮大铖这样的坏蛋手里，在他势力能够达到的地方，就能作威作福，坏事做绝。他依靠与马士英狼狈为奸，当上了兵部尚书（类似国防部长）兼副都御史（类似最高的副检察长）。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马上叫锦衣卫去抓陈定生、侯朝宗、冒辟疆，还有其他他认为必须拔掉的眼中钉。陈定生被抓去关了一夜。侯朝宗得信较快，早就逃走了。冒辟疆也好得有人报信，就在陈定生被捕的当夜逃到扬州，倚靠史可法的庇荫，躲掉一场灾难。一说冒辟疆从南京逃到徽州，又转到宜兴，藏在陈定生家里，却被阮大铖侦察到了，从宜兴抓获，押在江宁狱中，直到弘光逃走，才得脱牢狱之灾。^⑫但此节未载《冒巢民先生年谱》，不知可靠否。

接着清兵南下，弘光小朝廷如鸟兽散，复社的中坚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投降的投降，复社这个组织就基本上结束了它的历史。

以上，我们通过对复社的兴亡史，略见冒辟疆的为人，下面我再从他的友人的诗句中来想见他的风貌：

“辟疆才骨何芳坚，诸弟之中最少年，
轻薄裘马敦道义，和盘肝胆向人前。”

——陈 梁

“冒子嶽立挺高标，风流桃叶共听箫，
恂恂貌若子房子，更期司马早题桥。”

——吕兆龙

“冒子辟疆生雉皋，鼎开堂奥成深高，
帐中有秘藏蛟龙，墨海翻风行波涛。”

——刘渔仲

这些使我们在眼前隐现出一位翩翩佳公子，风流蕴藉，气韵

不凡。能文章，重义气，是诗酒声色场中的能手，却不是斩关夺寨阵中的上将。在明末，他和宜兴的陈贞慧、桐城的方以智、商丘的侯朝宗，被人合称为“四公子”。大概因为他们四人的年龄相仿（陈比冒大七岁，方和冒同年，侯比冒小七岁），同是复社的成员，一同结为诗文义气之友；当他们同游金陵的时候，往往登山临水，出入秦淮，连袂结袖，形影相随，因而在群众中造成了共同的印象吧？联系到后来由明朝转为清朝，他们几个人的政治表现，也可以见到他们共同的性格特征：冒辟疆和陈贞慧一样，隐居终老；方以智出家做了和尚；只有侯方域参加了河南的乡试，但也只中了一个空名的副举。他们都不是跟民族压迫者浴血奋斗的血性汉子。

在冒辟疆的青年时代，还有一段风流艳史，其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，超过了他名士才华的影响，增添了一层绮丽的光采，那就是他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相识和结合。

那时南京城里秦淮河那一段，岸边的楼阁和水上的画舫，聚集着许多争奇斗艳的歌女，其中最上等最出色的，不仅靠自身的色艺打扮，还以懂得若干诗词书画，腾贵了她们的身价。原来有明一代，从朱洪武起，就把首都定在南京。半个世纪以后，到成祖朱棣手上，于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虽把首都迁到北京去了，却仍称南京为留都（或南都、旧京）。中央政府的机构具体而微地设一个在南京（机构名称上加南京二字），以表示不忘这里是祖宗创业的基地。因此，南京这个六朝胜地，始终是繁华的，人物荟萃的地方。以声色招人的歌女而娴诗文，通词章，正是为了适应一班有钱财、有势力、风流而又不失风雅的老少爷们的需要。如今的青年读者，对明代公开卖淫的那种卑污罪恶的世道，难以想象了，但在那个时候，在士大夫们饮饯交际场中，招歌伎以侑酒，调笑谐谑，却是必不可少的排场。冒辟疆在《己巳倡和·聊